

文本的智能机制：界限、对话、时空

——对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研究的反思

张 杰

内容摘要：我国外国文学批评界习惯于把文学视为对社会现实的形象反映，尤其是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创作的研究中。其实，19 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文学文本的意义往往滋生乎其自身的智能机制之中。文学文本并非是一个静止的被动客体，也不只在传递和记忆信息，还是一个运动的、拥有主体性的生命体，能够通过界限转换、对话机制和时空变化等途径，作用于读者，在读者大脑左右半球的互动中，不断地创造意义。

关键词：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文本；对话；时空体

作者简介：张杰，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文论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 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研究”【项目批号：11BWW001】和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二期资助项目【项目批号：2014090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Intelligent Mechanism of the Text: Boundaries, Dialogue and Space-Time—Refl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19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Abstrac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s of foreign literature have already been accustomed to viewing literature as vividly mirroring social realities, especially in the studies of the 19th-century Russian literary creations. Actually, the literary creations by the classical 19th-century Russian writers could remain in circulation to date, largely due to their transcendence over their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ies and the fact that the meanings of the literary text often derive from its own intelligent mechanism. The literary text is neither a static passive object nor simply a device transmitting and memorizing information, but a dynamic organism endowed with subjectivity, which can work on the reader through boundary transpositions, the dialogue mechanism and space-time changes, continuously creating meanings in the hemispherical interactions inside the reader's brain.

Key words: 19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text; dialogue; chronotope

Author: Zhang Jie, is dean,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studies of literary theories. Email: z-jie1016@hotmail.com

翻开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创作的历史画卷，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的创作均与俄国社会解放运动的关系十分密

切,因此我国俄罗斯文学批评界几乎是参照19世纪俄国社会现实的发展线索,来撰写这一历史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史,甚至以农奴制废除等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来划分文学创作发展的各个阶段,相应提出了各个阶段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文学问题:“谁之罪?”、“怎么办?”等等。显然,社会功能确实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功能之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决定着文学自身发展的价值和影响。

然而,任何文学创作又不可能只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往往更取决于其自身的超现实性,也就是无论哪一个时期的读者都可能从文学经典文本中发掘出其各种不尽相同的意义。19世纪俄罗斯文学创作的艺术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对19世纪的社会现实本身的反映,成为此后甚至未来,人类各民族发掘不完的无穷宝藏。显然,文学文本的空间不再只是容纳了创作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而是拥有一个无限可阐释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由一个独特的文本智能机制构成的。在这个机制的作用下,文学文本可以随着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不断地创造出各种意义,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文本就是如此。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创作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非常有限的,而后人的解读和阐释则是无限的,只要人类存在,这种逆向的阐释就会不断地继续下去,每一代人都会对以前的意义进行重新的阐释。据此,我们在撰写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过程中,就不能够仅仅以作家创作与现实的联系程度,作为衡量创作价值的标准来加以评论,更不能把一部文学史写成作家创作的思想史,而是应该揭示作家创作文本意义再生的智能机制,文本的独特艺术构造以及这一艺术构造的演变。任何一个文学经典文本一旦产生,就是独立于作家而存在的,叙述的主体性应该是文学文本自身的主体性,是文学文本独立于作家主体性的艺术构造。文学文本自身的叙述主体性越强,其经典性就越强,其意义的再生就越多,其可阐释的空间就越大。本文主要以19世纪俄罗斯经典小说家的创作为依据,从文学经典对社会现实的超越、创作的自我对话以及时空敞开三个方面入手,把文学经典文本作为一个“活物”、一个独立的叙述主体,发掘文学经典文本的智能构造,揭示这一构造与读者大脑左右半球的相互作用,以期为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文本的界限转换

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最为深刻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卡拉马佐夫兄弟》被视为是其一生艺术创作的总结。从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层面来看,“作家在小说中描写了卡拉马佐夫家族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给周围的人带来的痛苦。这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反映出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和人们之间的畸形关系”(曹靖华 505)。作家通过这种现实的描绘,充分揭露了当时俄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丑陋,从而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这正是批判现实主义力量之所在。

然而,这种解读只是对这部文学经典作品的一种阐释,仅仅是基于文学反映论的立场。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之所以能够成为传世之作,其意义恰恰在于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于小说文本的无限可解读性。塔尔图大学符号学派的领袖洛特曼曾经明确指出:“文本作为意义的发生器是一种思维机制”(Лотман,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33)。他在自己的最后一部专著《文化与爆炸》中又进一步明确:“文本不再被理解为是一种静止的、特征稳定的客体,而是一种功能”(Лотман, *Культура и взрыв* 102)。其实,文学创作中的社会现实生活与我们人的大脑一样,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又存在着许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相互交织和冲撞就构成了文学文本的智能机制,即可以创造

意义的构造。

洛特曼认为：“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都具有内在的界限，其中一个是为主的，它把该文化模式划分为内、外两个空间”（Лотман, *Семиосфера* 484）；“界限是符号个性的主要机制之一”（Лотман, *Семиосфера* 257）。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至少交织着现实生活与宗教信仰、理智世界与非理智世界、伦理道德与变态畸形之间等等相互对立、交融的各个子系统，而且在每一个子系统中又会呈现出不同话语的声音。读者或批评者站在现实生活的文化圈内，就会对文本做出现实批评的阐释，而把宗教的世界放置到现实的对立面。以此类推，理智与非理智、伦理道德与变态畸形等也是如此。界限既可以划分，又能够连接不同的文化世界，正是这些世界和声音的融合和对峙，与不同时代读者的接受话语相遇，再生出小说文本无穷无尽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我们已经一百多年了，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其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也已经无法改动，但是对它的阐释却在不断地变化着，读者跨越不同的界限，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文学文本中，每一个人物个性的特征也均是凭借着界限来加以刻画的，此人物的特征是相对于彼人物而言的。如果读者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以阿辽沙的纯洁、善良、温顺和博爱为内世界，那么老卡拉马佐夫和长子德米特里、二儿子伊凡就呈现出淫虐、恶毒、暴敛和冷酷的外世界，这时阿辽沙的内在美就会彰显出来。不过，要是界限转换一下，读者从无神论的立场出发，又可以看到伊凡对上帝的叛逆，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抗议以及阿辽沙的软弱无力。当然，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魅力更主要地表现在内外世界界限的交叉之中，德米特里就挣扎在“魔鬼”和“上帝”之间，时而追求肉欲、粗暴残忍，时而又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下贱卑劣，在他那颗堕落的灵魂中，也不时会迸发出天良的火花，他帮助了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真诚地爱格鲁申卡，同情她的遭遇，甚至没有弑父，也甘愿接受惩罚，以求精神上的“复活”。伊凡虽然堕落为一个无视任何道德原则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但是他也曾经崇尚理智，钻研自然科学，勤于思索，追求美好的理想，同情人类的苦难。

界限是文学文本分析必须关注的重点之一，文本因为有了界限而形成结构。实际上，界限存在于整个文化空间中，不仅存在于文本的各子系统、人物个性之间，而且渗透在文本的各个层面、人物内心的深处。同时，界限也根植于我们的大脑，影响到文本的构造与读者的接受。界限的作用是双向的，既促进交流，也形成障碍，文本的意义就产生于这种交流与障碍之中。

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研究中，我国广大文学工作者已经习惯于以现实主义的批评尺度来衡量作品的价值。因此，文学创作对社会现实揭露的程度，典型人物的心理世界掘进的深度，成为了我们关注的重点，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也成为了一幅幅历史真实的真实图画和一个个活生生人物形象的展览馆。然而，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著名批评家往往从现实批评的视角，对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与作家本人对自身创作的评价出入很大，甚至迥然不同。小说《前夜》在杜勃罗留波夫的笔下，变成了真正革命到来的“前夜”，最终导致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与《现代人》杂志的决裂。别林斯基充分肯定了果戈理创作对现实的犀利批判，甚至把这位作家称为是俄国自然派的领袖，但却不理解晚年果戈理创作的宗教化转向，等等。

其实，这是由界限划定的不同文化符号圈所决定的。以别、车、杜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批评家们是立足于文学与社会现实的文化符号圈内，正是这一文化圈的界限与作家创作的超现实文化符号圈、宗教文化符号圈的界限相互冲撞，才会形成矛盾，甚至迥然不同的观点。

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都是读者站在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圈的界限内,与文本的某一或几个系统的界限相交流或碰撞,形成自己的文本意义。只要界限转换了,文本的意义就转变了,因此创作界限也成为了作家艺术表现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创作中,这种有意识创作界限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就往往通过在故事文本的叙述中夹杂着关于如何创作的议论,来增加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界限,以便达到“间离”或“陌生化”的效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采取了相应的创作手法,增强了读者的阅读效果。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文本结构上,普希金以塔吉雅那和奥涅金互相表白爱情为界限,设计了诗体小说对称式的“界限”构造。莱蒙托夫在代表作《当代英雄》中,则精心设计了刻画人物心理世界三个层次的“界限”,即故事情节的叙述、旁观者的评述以及自我心灵的剖析。

显然,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研究中,批评界应该把文学文本视为是一个具有智能机制的生命体,界限的转换则可以解读出文本的不同意义,每一个文本意义在一定的文化符号圈的界限内,都是成立的。文学文本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又更是现实的超越,文本的意义拥有无穷多的可解读性,但不可能存在终极性的阐释。

二、身份与反身份之间:创作的自我对话

在我国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早期研究中,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批评界往往依据“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原则,主要从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的政治视角去分析作品。比如,在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中,作家描绘了主人公格里涅夫与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之间的一段友谊。评论界仅仅从普希金是现实主义作家的身份出发,发掘了该小说同情农民起义领袖等的政治内涵,基本忽视了普希金作为一个重义气的朋友身份。实际上,因为在暴风雪的深夜,普加乔夫帮助了迷路的格里涅夫,而格里涅夫则把自己的兔袄赠予普加乔夫,因此俩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普希金的创作意义是由作家多元身份交织融合在一起,艺术地呈现在文本中的。

目前,无论在我国还是俄罗斯,文学批评界已经经历了由一元至多元的创作文本意义的解读过程,而且对作家的分析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评价,已经不再仅仅从一种文化身份去揭示作家的创作。在2007年出版的《今日俄罗斯文学》一书中,编撰者谢尔盖·丘普里宁在序言中就表明,文学自身是有生命力的“活物”,经典作家的身份是多元的,其创作意义也是纷繁复杂的,不可确定的(Чупринин 6)。例如,我们很难确定普希金究竟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果戈理是否晚期真地站到社会发展的对立面,失去了创作的才华,等等。

显然,任何一个经典作家都具有着不同的创作身份,批评不仅应该关注各种身份之间的关联,比如政治身份、阶级身份、宗教身份、亲情身份、友情身份、情缘身份等等,而且还要注意不同时期这些身份的交织、转换和发展。从不同身份的界限出发,我们就可能得出文本的不同意义。在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中,批评者只有把贵族伯爵、宣扬“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家、宗法制农民的代言人、暴力革命的反对者、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者等各种身份融合起来,才能够认识到托尔斯泰创作的复杂意义。

然而,如果批评仅仅局限于此,即便是揭示出了文本创作意义的丰富性,还是相当不够的,因为这还不足以揭示文学文本的审美智能机制,无法发掘文学创作文本的艺术价值

的产生过程。其实，文学经典的艺术审美价值恰恰在于作家创作身份的自我克服，也就是文学文本的艺术价值产生于身份与反身份话语的对话之中，对话可以说是文学文本智能机制的核心，对话的过程是文本艺术价值产生的过程。

洛特曼在“大脑 - 文本 - 文化 - 人工智能”一文中指出：“思维机制自身应是一个符号体，并需要另一个符号体”（Лотман, *Семioticsфера* 589）。文学文本作为一个智能的意义生成机制，其中各个不同的符号体之间具有对话和游戏的性质，它们的碰撞形成了文本的复杂加工，导致意义的增殖和变化，文本不再有固定的终极意义。不过，在对话的理解上，洛特曼迥异于巴赫金。巴赫金的对话方式是“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5:379）。也就是说，巴赫金的对话是“我”与“他”之间的对话，而洛特曼则不满足于此，更主要强调的是“我”与“我”之间的对话。塔尔图大学托罗普教授就说过，文化符号学更重要地是要研究文化信息的自我对话（Torop 112）。在对作家创作文本的研究中，这种“我”与“我”的对话，主要就表现在作家创作身份与反身份之间的对话之中。

其实，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对话的过程。长篇小说《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呕心沥血，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之后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艺术探索。根据作家本人 1895 年 11 月 5 日的日记，从 1889 年动笔至 1895 年，整整六年的时间，列夫·托尔斯泰对《复活》的开头反复修改，终于明白应该把写作立场转移到平民这边，也就是从玛丝诺娃的冤案写起（贝奇科夫 496）。托尔斯泰以深切同情的笔触描绘了俄国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以批判的视角审视着自己所属的上流社会。正是托尔斯泰克服了自己贵族伯爵的身份，在平民与贵族、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我”与“我”之间的对话，才形成了创作的巨大艺术魅力。

同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的自我对话还清晰地表现在独特的艺术设计和叙述中。翻开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画卷，我们不难发现，这位伟大的作家竭力在使得自身伟大的创作尽可能避免奇特性，也就是让创作本身更接近生活。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均不是以情节取胜，甚至生活的叙述也是慢慢铺展开来的，仿佛作家在与自身的创作身份对话，让创作更加生活化。托尔斯泰的对话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者是蕴含于时间流失的过程中，后者则是建立在空间呈现基础之上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也很难看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大多数情形是人物自我的内心对话或独白。作家揭示的是心灵演变的过程，即“心灵辩证法”（《安娜·卡列尼娜》），或者是由结果激发的“心灵的涟式反映”（《复活》）。因此，巴赫金甚至认为列夫·托尔斯泰笔下人物个性的话语是独白式的。其实，这种“独白”是人物自身的自我对话，彼埃尔躺在战场上的遐想是如此，安娜卧轨前的独白式也是如此，聂赫留朵夫的自我忏悔更是如此。

显然，对话是文本思维机制的重要核心，这里既有作家身份与反身份之间的对话，也有创作艺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对话，更有建立空间中的人物自身对话，也有时间演变先后中的人物心灵对话。对话的职能机制是在与读者的历史接触中发生作用，并产生出无穷多的解读意义的。

三、大脑的左右半球之间：文本的时空敞开

在论及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创作文本的智能机制时，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还是以洛特曼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学批评，都是把文本的空间性研究放在第一位的，这也雷同于

自然科学研究,不把时间或动态的因素撇开,就难以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研究中,我国批评界自然非常关注文学创作产生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但是对于作家创作文本或艺术形象发展内在的时空体,研究较为薄弱,特别是对于读者大脑左右半球的接受与文本人物性格时空敞开之间的关系则研究更少。然而,经典文学文本自身的敞开构造与读者接受渗透之间的艺术联系,则是探索19世纪俄罗斯文学创作意义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揭示文学文本智能机制的关键。

可以说,文学文本要真正的“活”起来,“动”起来,离开时间因素肯定是不行的,没有时间,空间就是静止的。我们通常说,时间就是生命,文学文本的生命智能机制也正是依靠时间因素,才能够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体。巴赫金曾经明确指出:“文学作品中的时空关系研究,……主要是研究时间关系”(3:460)。巴赫金提出的时空体是以时间为第一要素的,甚至时间是研究空间的前提,文学文本空间的对话机制也必须通过时间才能够作用于读者的大脑,具有生命力,产生智能作用。

在分析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时,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往往关注的是两条交织的线索,即安娜的爱情悲剧和列文的精神探索。安娜与渥伦斯基之间的悲剧盘桓于放荡不羁的俄罗斯贵族上流社会,列文与吉娣的生活则根植于淳朴浑厚的俄罗斯宗法制农村。从作家的本意来说,这两条线索决非只是要描绘一幅社会历史图画,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剖析人的灵魂,为贵族自身,也为人类探索一条理想的生活和精神之路。安娜和列文这两个与上流社会抗争的贵族男女,在时间的长河中,挣扎着、困惑着、痛苦着,最终安娜的灵魂向下坠落,而列文的灵魂则由基督精神的拯救向上升华。这也是列夫·托尔斯泰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设计好的创作意图。

然而,在每一个人物的心灵世界内还存在着一个时空体,一个矛盾对话的、不匀质的时空体,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组对话不停地碰撞,向读者不断地敞开,形成一种开放的智能机制。具体说来,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内心世界是由两个世界时常对话、交织而成的。一个世界是意识世界范围内的,由社会伦理思想主导的理智世界,另一个是潜意识世界范围内的,由文学伦理支配的感性世界。这两个世界分别作用于读者大脑的两个半球,一般说来,左半球是理性思维的半球,运用语言文字进行演绎、推理、分析,右半球则是感性活动的区域,受到情感、形象、本能的作用。

长篇小说一开始,在安娜的心灵世界中,以他人幸福为前提的社会伦理思想(理性思维)是占上风的,而追求自我幸福、主张个性解放的文学伦理思想(感性活动)则占下风。随着故事情节的渐渐展开,在这种理性与感性的对峙中,后者声势逐渐壮大,最终安娜在观看赛马时的失态,标志着感性占了上风,甚至最终战胜了前者,导致了安娜的悲剧性结局。读者在阅读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时,左半球受到列夫·托尔斯泰的主观意识和社会现实反映的影响较大,而右半球则潜移默化地感受着安娜向往自由的女性情感以及超越现实羁绊的精神追求。读者大脑的两个半球之间,由于与文本的个性时空体相互作用,各种意义就滋生出来。原先被作家托尔斯泰定义为不贞洁的女人安娜,成为了争取自由解放,与上流社会抗争的新女性。反而,被作家树立为理想生活楷模的列文,虽然从正面传达着托尔斯泰的人生理想和俄罗斯民族古朴的道德及宗教信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使在情感生活上,列文也并非幸福,甚至他多次因内心困惑与迷惘,心理和情感上的不满足,而想到自杀。

洛特曼认为:“符号空间结构上的不匀质性形成了动态变化的潜能,是创造新信息的

机制之一”（Лотман,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16）。任何文学经典文本的时空体都是不匀质且不断变化的，这种不匀质和变化既源于文本本身的内在构造，即对话的时空体构造，更受制于读者阅读的时空体语境。在读者语境的转换中，文学文本的智能机制也会发生变化，即“中心”与“边缘”的互动转移，从而再生出不同的意义。

一般说来，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任何一部文学经典作品问世的时候，均是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一面会立即引起批评界的关注，也就是作品更容易作用于读者或批评者大脑的左半球，导致批评以理性分析为“中心”，例如主题思想的发掘、社会意义的揭示、艺术特色的评价等。但是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文本的时空体则渐渐更多地作用于读者或批评者大脑的右半球，也就是超越社会现实的情感、本能、人性等因素逐渐由“边缘”转向“中心”。读者不仅只感兴趣19世纪俄罗斯的社会状况，而更感兴趣经典文本传输的普适性的情感问题。当代读者会从古典文学的文本中汲取现代所需的养料，而这一部分则较多地是依靠右半球的情感功能来实现的。这种“中心”与“边缘”的转换和移动，就形成了文本的智能机制，就如同人的大脑的左半球向右半球传送信息，使得文本在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中真正“活”了起来。

显然，文学经典文本就如同一个不匀质的万花筒，文本自身的时空体就如同万花筒的“筒”，而各种人物性格的理性世界和情感世界就如同色彩斑斓的形形色色的小色块，只要随着时空的变化，也就是万花筒的摇晃，就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图画。这只摇晃万花筒的手就是读者的阅读，是读者阅读过程中大脑左右半脑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创造。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文学文本是“说不尽”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智能型意义再生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六卷本），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Bakhtin, M. M. *The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6 vols. Ed. Qian Zhongwen.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贝奇科夫：《托尔斯泰评传》，吴均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Bytchkov.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Leo Tolstoy*. Trans. Wu Junxi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9.]

曹靖华主编：《俄苏文学史》（第一卷）。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Cao Jinghua, ed.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Vol. 1. Zhengzhou: Henan Education Press, 1992.]

Чупринин, Сергей.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егодня: Жизнь по понятиям*. М.: Время, 2007.

[Chuprinin, Sergey. *Russian Literature Today: Life of Concept*. Moscow: Time, 2007.]

Лотман, Ю. М. *Культура и взрыв*. М.: Гнозис, 1992.

[Lotman, Yu. M. *Culture and Explosion*. Moscow: Gnozis, 1992.]

---.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1. Таллин : Александра, 1992.

[---. *Selected Articles in 3 Volumes*. Vol.1. Tallin: Alexandra, 1992.]

---. *Семьюсфера*.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00.

[---. *Symbol Context*. St. Petersburg: Art-St. Petersburg, 2000.]

Torop, Peeter. "Semiotics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Cultural Analysis."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1 (2014): 109-17.

责任编辑：王树福